

张再林 著

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

——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再林 著

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

——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张再林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6
(博雅文丛)
ISBN 7-02-005208-8

I. 唐… II. 张…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唐代②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7376 号

责任编辑:宋 红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宋 红 责任印制:王景林

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

Tang Song Shi Feng Yu Ci Feng Yan Jiu
张再林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02-005208-8

定价 18.00 元

序

杨海明

一般来讲,人们在关注中晚唐时期“词继诗兴”的这段史实时,往往多把注意力投注在“花间鼻祖”温庭筠的身上。这自然是不错的,因为温庭筠可称词史上第一位“专业作家”,他为文人词(主要是风格婉美的小令词)的艺术风范奠定了基石。但其实,文人词的真正的“开山祖师”却应是白居易而非温庭筠。这是因为:第一,白居易与刘禹锡两人曾“依曲拍为句”创作《忆江南》词并相互唱和(刘禹锡《忆江南》词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就改变了以往用“声诗”来合乐的比较保守的做法而进入了“依谱(音谱)填词”的阶段,标志着词体的正式确立和文人词的从“声诗”中独立而出。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主要指其后期阶段)曾对宋代文人词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不独是苏轼“独敬爱乐天”,几乎大多数的宋朝士大夫皆“多慕乐天”——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居易就不但是后代诗坛上的“广大教化主”,而且也是宋代词人所私心仰慕和仿效的人生楷模和“先行者”。再说得通俗一点,则以往文化人所企慕的前代诗人大致有两类:一是屈原那样忠君爱民的诗人,二是陶渊明那样隐逸清高的诗人;而白居易后期的人生实践却为宋人提供了另外的选择:在其私生活中可以纵情

声色,沉湎诗酒;也可以逍遥自在,享受“闲适”。这就为他后来的文人作出了“示范”。而相比之下,词这种精神产品就比正统的诗文作品更倾向于表现士大夫文人在私生活领域内产生的某些情志,所以白居易在词史上的地位及其对晚唐两宋词的影响就应予以充分重视,并值得重新审视。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而已,并无坚实的文学史料作为支撑,也缺乏深邃的理论思索。但当我把这些随想告诉当时正在“读博”的张再林同学之后,他却果断地把它选定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经过近三年的苦读苦思和勤奋写作,终于完成了这本题为《唐宋士风与词风》的研究成果,这实在令人高兴和值得庆贺。

确切些讲,这篇博士论文所着重探讨的论题即是:中唐至北宋时期士大夫文人的“士风”(思想特质、行为习惯、文化心理倾向等等)与词风的动态联系及衍变过程。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文人词的兴起与初步繁荣以及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明显受到了士人人格从“才子”经由“浪子”再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发展历程的影响;而词中的闲适、旷达之风则与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息息相关;“佛道词”的出现又与士人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密不可分;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更直接导致了文人词的崇尚“婉约”。这些内容,由于建筑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又加以以合理的理论分析,因而显得相当丰满和可信,且有不少创新之见。当然,由于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和永无止境的工作,所以,再林同志虽已取得了某些成绩,但前面的路却还十分遥远。在此,衷心企盼他能继续前进,今后获取更新更多的研究成果!

2005年3月20日

目 录

序	杨海明
引论	1
一、从苏轼“独敬爱乐天”说起	1
二、“本(宋)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	9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3
第一章 唐宋士风与词风的历史文化阐释	26
第一节 中唐——两宋的历史文化形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26
一、中唐与两宋同属“庶族地主文化构型”	26
二、萌芽于“平民阶级”(庶族地主阶层)的文人词	32
三、唐宋儒家思想的衍变与词史流程	44
第二节 白居易是庶族地主文化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	54
一、白居易的人生实践及其典型意义	54
二、白居易与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的比较	66
三、白居易是文人词的“开山祖师”	71
第二章 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历程与词之发展的关系	88
第一节 “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	
——中唐士人的才子人格与词的兴起	88
第二节 “春初携手春深散,无日花间不醉狂”	
——晚唐、五代士人的浪子人格与词的初步繁荣	100

第三节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与“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馀名字” ——宋代士人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人格 观念与词的多元化发展	110
第三章	士人的“中隐”文化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士人对精神解脱的追求与词之发展的关系(一)	133
第一节	“中隐”辨	134
一、	对中唐以前有关“隐”的各种说法的历史回顾	134
二、	“中隐”是指一种闲旷的文化心态	136
第二节	宋代士人对“中隐”的实践及其对词的影响	145
第四章	士人的迁谪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士人对精神解脱的追求与词之发展的关系(二)	170
第一节	对宋代以前士人迁谪心态的历史回顾	170
第二节	宋代部分士人对待迁谪的超越心态及其迁谪词风	175
第五章	士人对佛道思想的“实用心态”及其对词的影响 ——士人对精神解脱的追求与词之发展的关系(三)	196
第一节	中晚唐、五代士人对佛道思想的“狭义实用心态”及词中表现	197
第二节	宋代士人对佛道思想的“广义实用心态”及词中表现	209
第六章	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与词尚婉约	229
第一节	“婉约”是指一种柔美型的艺术风貌	231
第二节	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及词中表现	235
第三节	士人对女性的同情、尊重态度与婉约词风的“雅化”	250

结束语	270
主要参考书目	273
后记	282

引 论

一、从苏轼“独敬爱乐天”说起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772—846)与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一位是我国(中)唐代继李(白)、杜(甫)之后的杰出诗人,一位是北宋时期的一代文坛盟主。这两位文坛大家的生活年代虽然相隔数百年之久,然而,东坡对乐天却怀有很深的敬慕之情。前人曾屡屡谈及这一点,如宋人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言:

本朝苏文忠公(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洪迈在《容斋三笔》卷五中也说苏轼之号“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而叶真在《爱日斋丛钞》卷三中言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前就已对白居易怀有敬慕之意了:

东坡之慕乐天，似不尽始黄州。《吊海月辨师》云：“乐天不是蓬莱客，凭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时作，已有慕白之意矣。坡诗注：《卢子逸史》，会昌元年，有南客飘至大山，有人引至一处，见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莱山也。”宫内院宇数十，而一院扃锁，曰：“此白乐天宫。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乐天闻之，遂作《答客说》诗：“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则应归兜率天”。又《与果上人》诗：“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观引用此事，知其已慕白也。守胶西《和张子野竹阁见忆》云：“柏堂南畔竹如云，此阁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鹤氅，不须更画乐天真。”或谓此自属之子野元祐经筵赐御书乐天紫薇花绝句，又不独公以此自拟也。

明人袁中道则说得更为具体，他认为白、苏二人在“心”、“操”、“趣”、“才”、“学”诸方面都可谓是大同而无二致：

……两公真有大同焉者：吾观乐天、子瞻为人，大约皆真实淳笃，不立城府……是其心同也。乐天典大郡，所携不过天斋石、华亭鹤、折腰菱，晚年买履道里宅，至鬻骆马；子瞻虽处颠沛，不轻受人丝毫，无田可归，竟至流落……是其操同也。若夫醉墨淋漓于湖山，闲情寄托于花月，借声歌以写心，取文酒以自适，则乐天、子瞻萧然皆尘外人……是其趣同也。乐天、子瞻，其文词皆为一代宗匠……是其才同也。乐天、子瞻虽现宰官之身，皆契无生之理……是其学同也。^①

另外，宋人王直方的《王直方诗话》，明人高鹤的《见闻搜玉》、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清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以及日本学者近藤元粹的《苏诗纪事》等等，均有类似之言，兹不具引。

苏轼之慕白居易，“屡形诗篇”^②，“不止一再言之”，^③下面是苏轼诗中的有关言辞：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迳英……各述所怀》之四）^④

它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④

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善相程杰》）^④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予去杭十六年……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作三绝句》之二）^④

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挂冠及未耄，当获一纪闲。（《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④

而这也就不怪乎明人高鹤会感叹苏轼“景仰白公，可谓至矣”了。^⑤

谈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其一，除白居易之外，苏轼对前代的很多人物都表示过钦许之意，故此，是否能说他是“独敬爱乐天”呢？其二，众所周知，苏轼曾有过“元轻白俗”^⑥的言论，这是否意味着他对白居易也有不满之处？下面就让我们针对这两个疑问做一些辨析。

先说第一点。的确，苏轼曾称许过很多前贤，其中对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尤为推重。如他高度评价陶渊明、柳宗元的诗“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⑦“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⑧晚年迁谪边远之地时，常置陶、柳集于左右，目为“二友”，^⑨并作《和陶诗》达一百零九首之多；又如他曾称赞李白、杜甫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⑩推扬韩愈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⑪另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苏轼作诗“始学刘禹锡”，这表明他对刘禹锡也曾是很好感的。但另一方面，苏轼对上述诸人又都颇有微辞。如他认为陶渊明并非真正的“达者”：

陶渊明作《无弦琴》诗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苏子曰：“渊明非达者也，五音六律，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无琴可也，何独弦乎？”^⑫

其（陶渊明）《自祭文》出妙语于纾息之余，岂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犹以生为寓，以死为真，嗟夫，先生岂真死独非寓乎？^⑬

类似的意见，苏轼在诗里也曾表达过。如他在《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诗中言：“无弦则无琴，何必劳抚玩。我笑刘伯伦（伶），醉发蓬茅散。……孰云二子贤？自结两重案”。^⑭而尤可注意者，苏轼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致穷困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曾有“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之论，^⑮也并不认可陶渊明“穷苦自把锄”、^⑯“每为饥所迫”^⑰的生活状态。而对陶渊明的穷酸之气他也感到不满：

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⑱

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予（苏轼）偶读渊明《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⑲

再如,苏轼曾言李白乃“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②他还曾讥讽杜甫的“书生习气”:

仆尝梦见一人,云是杜子美(甫),谓仆:“世多误解予诗,《八阵图》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意,此为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犹不忘诗,区区自明其意者,此真书生习气也。”^③

他又批评韩愈对“圣人之道”只是“趋其名而好之”而已,并非“安其实而乐之者”:

圣人之道,有趋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实而乐之者……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④

甚至斥刘禹锡为“小人”:

刘禹锡既败,为书自解,言:“王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所施为,人不以为当。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对,官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由是及贬”。《后汉书·宦者传·论》云:“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腾与梁冀比舍清河而立蠡吾,此汉之所以亡也,与广陵王监国事,岂可同日而语哉!禹锡乃敢以为比,以此知小人为奸,虽已败犹不悛也,其可复置之要地乎?”^⑤

又指柳宗元为“(诞)妄”，说他是无所忌惮的“小人”：

柳宗元敢为诞妄，居之无疑。吕温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虽子产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称温之弟恭，亦贤豪绝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龄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为裴延龄婿者乎？宗元与伾、叔文为交，盖亦不羞于延龄姻也。^②

柳宗元《五就桀赞》，终篇皆妄，伊尹往来两国之间，岂其有意欲教诲桀而全其国邪？不然，汤之当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过而免于讨，可庶几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虽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③

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耳。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④

而惟独对白居易，苏轼不仅没有表示过不敬之意，并且还处处替他“辩护”。例如，众所周知，藩镇割据是唐代中、晚期的一大政治痼疾，当时忠臣义士对割据作乱的藩镇无不切齿痛恨，坚决主张用武力平叛。然而，白居易却不主张对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叛乱进行武力讨伐；对此，苏轼为其辩解云：

吴元济以蔡叛，犯许、汝以惊东都，此不可不讨者也。当时议者欲置之，固为非策，然不得武(元衡)、裴(度)二杰士，事亦未易办也。白乐天岂庸人哉！然其议论，亦似欲置之者，其诗有“海图屏风”者，可见其意，且注云：“时方讨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于兵，盖不忍轻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怀，况欲弊所恃以勤无用乎？悲夫，此未易与俗

士谈也。^⑦

再如，白居易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为感“甘露之变”而作：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
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⑧

时宰相王涯死于这场变乱之中，而当年白居易因首上书论武元衡之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之事而遭构陷时，最初本是被贬为江表刺史；后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上疏言白“所犯状迹，不宜治郡”，^⑨唐宪宗无奈下诏追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故有人据王、白之间的这一段过节而认为此诗乃白居易幸灾乐祸之言，苏轼针对这种言论特作辩解云：

白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在洛，适游香山寺，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⑩

东坡此言，可谓深契乐天情怀之论，故得到了后来的学者如陈振孙、瞿佑、汪立名等人的广泛赞同。^⑪

再来看第二点。苏轼的“元轻白俗”之论见于其《祭柳子玉文》：

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甚敏而文，声发自幼。纵横武库，炳蔚文囿。独以诗鸣，天锡雄味。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⑫

苏轼的这篇祭文意在称诵友人柳瑾(字子玉)高逸脱俗的品行和

出众的文才,所谓“嘹然一吟,众作卑陋”之语实为溢美之辞。至于柳瑾其人,任何一部文学史都不曾提到过;从他今存于《宋诗纪事》的几首诗来看,实难说胜过元、白、孟、贾诸人。因为是祭文,苏轼的这种措辞是可以理解的。再者,关于“元轻白俗”之“俗”字亦有可论之处。众所周知,苏轼论人,以“俗”为最不可取,他曾有言“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③但这里说的“俗”指的是人的胸次品格、精神境界,是“庸俗”、“鄙俗”之“俗”;而他所说的“元轻白俗”,是就文学作品的风格而言的,是“通俗”、“浅俗”之“俗”。人品可以高下论,风格却不能以优劣言。比如我们不能说李白诗的“豪放飘逸”胜于杜甫诗的“沉郁顿挫”。又言之,苏轼自己的创作何尝没有“俗”的一面?苏轼好以街谈市语,俗字俚语入诗,如其《次韵沈长官三首》其三“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之“帆饱”、“水肥”,都是方言俗语;^④《次韵孙秘丞见赠》中“不怕飞蚊如立豹”之“立豹”,据苏轼自注“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知豹脚乃蚊名;^⑤《发广州》“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馥”之“软饱”、“黑甜”,据苏轼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⑥《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之“牛矢”,^⑦《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中“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之“牛粪”^⑧《和陶下田舍获》中“聚粪西垣下,凿泉东垣隈”之“聚粪”^⑨等语,卑俗已极。可见苏轼亦有自觉追求诗歌语言通俗化的一面。此正如清人马位《秋窗随笔》中所言:

东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元轻白俗”……然东坡诗熔化乐天语及用乐天事甚多,如:“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

梨花枝上雨”，“不似杨枝别乐天”，“海天兜率两茫然”，“肠断闺中杨柳枝”之类。虽作此论，终不免践乐天之迹。

故此，苏轼所言之“白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贬义。

了解了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苏轼的确是“独敬爱乐天”、对白居易“情有独钟”的。

苏轼“独敬爱乐天”的事实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并促发了一系列思考：在宋代，苏轼对于白居易的敬慕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还是一种典型的现象？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它对有宋一代的文学（我们这里主要是谈词）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本书的引论部分，我们先来解答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二、“本(宋)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

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丙编卷三中说：

本(宋)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

这就提示我们，在宋代，对白居易的敬慕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苏轼之“独敬爱乐天”则是这种普遍现象中的典型例子。或许是因为这方面的事例在当时极为常见，故而罗大经说这番话时无需举证；然而我们今天来研究这个问题，显然就须拿出足资说明问题的证据方有说服力。

有宋一代，士人敬爱、仿慕白居易的事例非常多见，我们随手就可以举出很多例证来。

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说宋初诗人“常慕白乐天体”，蔡居厚亦云：“国初沿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④宋初诗坛流行“白体”，所谓“白体”，即是学习、仿效白居易吟玩情性的闲适